



## 编者寄语

# 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国际关系研究

漆海霞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国际政治科学》共同主编)

2025年春,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DeepSeek一鸣惊人,引起美国OpenAI等科技巨头震动,美国股市中英伟达等美国高科技企业的股价大跌,甚至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DeepSeek以其训练成本优化、对标头部闭源大模型的性能、用户可见的思维链、对模型设计训练思路及模型参数的高程度开源等优势,打破了美国科技界对AI的垄断,是自从ChatGPT面世以来人工智能技术的新突破。相较于ChatGPT等闭源大模型,DeepSeek的开源可能会降低大模型的研究和应用门槛,进而加速AI技术在全球的普及和应用,形成人工智能的应用浪潮。那么,在此浪潮下,不断普及的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政治将可能产生何种影响?这是学界当前应该考虑的议题。

笔者认为,与核技术相似,人工智能技术将对国际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可能促成新的战争模式,不同之处在于,核武器主要由大国掌握,核不扩散是国际规范,核禁忌与核威慑有助于维护国际秩序,而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在军事领域应用,也可以应用于国内社会各行各业,管控人工智能的国际规范尚未形成。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于AI技术的研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学界应该关注以下问题:如何评估AI在国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应用AI技术可能使国际关系出现何种新现象?国际社会如何制定规范管控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

## 一、人工智能技术将影响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

科学技术往往通过影响国家实力变迁而影响大国的兴衰。例如,二战后,核技术的垄断巩固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地位。作为新兴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也会对大国竞争格局产生影响。

作为强人工智能的里程碑,ChatGPT 的问世使人们意识到,这一技术可能对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变革性影响。人类的部分工作可能被人工智能算法下的新技术所替代,进而可能导致行业变迁与就业问题,并深刻影响国家综合国力。OpenAI 等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司为了维持技术垄断,并没有开源,导致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呈现美国与中国两个大国远超其他诸国的两极局面<sup>①</sup>,并逐步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亦即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拥有先发优势的国家,可能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国力发展上远超不掌握 AI 技术的国家,拉大国家间的差异,而不具备人工智能技术能力的国家可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落伍,进而导致恶性循环。

开源的 DeepSeek-R1/V3 出现后,上述局面可能会发生改变。开源技术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国际合作等途径快速传播,导致技术优势的窗口期缩短,各国难以长期维持垄断的技术护城河。与此同时,DeepSeek 的应用成本相对较低,其公开的硬件优化方案及其开源的完全体模型参数可用于模型蒸馏,使得更多中小国家有能力加以应用,将使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出现发展速度快、技术迭代迅速、扩散普及面广的局面。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普及和被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普遍采用的前景下,这一技术可能成为国家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各国可能围绕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应用领域与治理体系等展开竞争,进而可能围绕人工智能形成技术军备竞赛,这将进一步影响国家间的竞争格局。

## 二、人工智能技术将改变现代战争模式

人工智能也将对战争模式构成挑战。俄乌冲突中,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战场,如无人机、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笔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可能通过战场应用和相关决策系统形成新的作战模式。

在战场进程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可能改变攻防优势与攻防认知,进而改变战争的爆发、进程与胜负结局。攻防平衡会影响国际冲突风险,进攻优势

---

<sup>①</sup> Lance Y. Hunter, Craig D. Albert, Christopher Henningan and Josh Rutland, "The Military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Russi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Security,"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Vol. 39, No. 2, 2023, pp. 207-232.

可能诱发先发制人的攻击或预防性战争,而防御优势则可能降低主动攻击的风险。<sup>①</sup>技术是影响攻防优势的重要因素,铁路、枪炮与核武器等技术都对现代战争的攻防平衡转移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sup>②</sup>在俄乌战场,无人机和自动化系统借助AI技术已经大显身手。<sup>③</sup>以色列国防军在对抗哈马斯时,也利用AI技术精准定位哈马斯高层,提升了打击的有效性。<sup>④</sup>除了武器应用之外,人工智能技术还应用于战争决策环节,通过数据和算法进行评估、预警,进而提供可能的最佳应对方案。

从攻防优势角度看,无人机和精准定位系统等技术可以提高进攻准确率,降低进攻的伤亡,可能使攻防平衡倾向于进攻优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决策系统在寻找最优解的算法控制下也会谋求提升获胜概率,寻找获胜的最佳方案,可能使攻防认知也有利于进攻。因此,不同于核武器技术带来的以核威慑战略为主的防御优势,人工智能技术可能提升进攻优势,进而加剧国际动荡。

在俄乌战场和以哈冲突中,人工智能武器与决策系统在精准定位、大数据处理、战场预测等方面展现出颠覆性军事潜能,各国在观察到现状后将吸取经验,大力发展建立在大数据与云计算基础上的智能武器,甚至可能形成基于智能武器、注重精准打击的新型作战模式和新型军备竞赛。<sup>⑤</sup>伴随着DeepSeek的开源以及由其开源而导致的新一轮大模型开源浪潮,人工智能技术的国际扩散将加快,各国会调整自身的大模型发展战略,可能在未来的

<sup>①</sup>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78, pp. 167-214.

<sup>②</sup> Keir A. Lieber, “Grasping the Technological Peace: The Offence-Defense Bala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2000, pp. 71-104.

<sup>③</sup> “Battlefield Drones and the Accelerating Autonomous Arms Race in Ukraine,” Modern War Institute, <https://mwi.westpoint.edu/battlefield-drones-and-the-accelerating-autonomous-arms-race-in-ukraine/>, 访问时间: 2025年2月26日。

<sup>④</sup> “‘The Machine Did It Coldly’: Israel Used AI to Identify 37,000 Hamas Targets,”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4/apr/03/israel-gaza-ai-database-hamas-airstrikes>, 访问时间: 2025年2月26日; Elizabeth Dwoskin, “Israel Built an ‘AI Factory’ for War. It Unleashed It in Gaza,”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4/12/29/ai-israel-war-gaza-idf/>, 访问时间: 2025年2月26日。

<sup>⑤</sup> Stuart Russell, “AI Weapons: Russia’s War in Ukraine Shows Why the World Must Enact a Ban,” *Nature*, Vol. 614, Issue. 7949, 2023, pp. 620-623.

冲突中采用更多的 AI 技术,从而进一步降低国际秩序的稳定性。

### 三、人工智能与新规范

在核武器问世后,由于其前所未有的破坏力,人类快速就核禁忌达成共识,核武器的使用局限于核威慑,大国间就核不扩散达成相应规范。然而,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以及相应的规范尚未达成共识,随着 DeepSeek-R1/V3 的开源,人工智能技术从大国扩散到中小国家的大势不可逆转。在新技术为人类社会提供便利、提升人类福祉的同时,在大国战略竞争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也需要考虑适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国际规范。

首先需要考虑人工智能技术对各国内政外交的影响,鉴于 AI 技术的颠覆性,各国在拥抱新技术的同时,围绕新技术的国际竞争将愈加白热化。其一、人工智能技术可能通过影响国内社会而影响国际竞争,新技术的布局可能带来产业升级,各行各业都可能受到 AI 技术的影响而出现新的就业导向,各国劳动力的失业与工作不稳定问题可能加剧国内压力与对政府的不满,进而导致国内不稳定性增强,以及危机对外转移下的国际冲突风险。其二,人工智能技术可能通过影响舆论而影响外交决策。传统的外交决策需要基于真实的民意进行风险判断,进而寻找稳妥审慎的外交对策。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可能通过 AI agent 提供模拟样本,甚至可能通过 AI 机器人在网络发言,导致数据污染,基于网络的舆情分析和外交研究可能被误导,进而引致外交判断与对策的失误。

其次,对于 AI 技术可能存在的滥用问题以及加大冲突风险等问题,国际社会并没有形成相应规范。人工智能技术与核武器的一个显著差异是,前者为军民两用技术,而后者主要局限于军用。因此,大国在核技术高门槛的前提下达成核不扩散规范。而人工智能技术由于其民用的高度便捷性,目前已经快速扩散,故而国际社会也要提前筹谋该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并加以预防。例如,当冲突方根据人工智能决策系统推荐的最优选择逐步升级危机并导致战争时,人工智能算法是否需要承担决策的道德责任以及战争罪责?此外,由于 AI 算法的黑箱特性,若 AI 决策系统存在算法缺陷或训练数据偏差,或者将错误信息输入决策,人类对 AI 决策系统的盲目信任可

能导致错误决策,如何避免在外交决策与冲突决策中对AI的误用?另外,在AI技术扩散时,如何规避可能被国际恐怖组织掌握进行跨国犯罪等滥用问题?

上述问题都需要各国加强合作,为了人类社会的未来共商对策,形成合理的规范,既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又要避免各国在此领域出现恶性竞争,还要规避技术变迁与攻防平衡转移可能带来的冲突风险。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人工智能技术上的推陈出新,给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和实践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制定合理的国际规范,如何应用国际规范约束人工智能的滥用,如何使AI技术创新更好的服务于人类福祉与全球治理,需要全球国际关系学界同仁的共同探讨。